

关于章学诚史学批评的一点批评

瞿林东

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阐述文学与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，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多。从他的诸多论述中，可以看到他对史学的许多独到的认识，进而反映出他的史学观的某些特点。正是这些特点，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并把它发表出来，不当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 “唐宋至今”无“古人所为史学”？

章学诚认为，中国史学之源是《春秋》，而史学之流则是《春秋》家法的反映。

章学诚在讲到人们“立言有本”时说“史学本于《春秋》；专家著述本于《官礼》；辞章泛应本于《风诗》，天下之文，尽于是矣。”^①上面引的这几句话，也是指史部书、子部书和集部书而言。同时，他认为，上述三者有所本，但三者也都有末流，这就是“史乘而有稗官小说，专门著述而有语录说部，辞章泛应而有猥滥文集，皆末流之弊也。”^②这里说的“末流之弊”自亦包含了章学诚对史学在发展上的认识与评价。

关于“史学本于《春秋》”这一论点，章学诚在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：

世士以博稽言史，则史考也；以文笔言史，则史选也；以故实言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《立言有本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202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02页。

史，则史纂也；以议论言史，则史评也；以体裁言史，则史例也。唐宋至今，积学之士，不过史纂、史考、史例；能文之士，不过史选、史评，古人所为史学，则未之闻矣。^①

这段话，包含着两个相互连带着的认识和结论，一是史考、史选、史纂、史评、史例，皆非古人所致力之史学，二是“唐宋至今”的“积学之士”与“能文之士”中是否有名副其实的史家自也成了一个问题。这样一来，“唐宋至今”还有史学存在么，还有史学的发展么？是不是这都成了问题呢？

那么，章学诚所说的“古人所为史学”是什么呢？这当然还要从《春秋》和“《春秋》家学”谈起。他认为“马曰‘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’，班曰‘纬六经，缀道纲，函雅故，通古今’者，《春秋》家学，递相祖述，虽沈约魏收之徒，去之甚远，而别识心裁，时有得其仿佛。”^②在章学诚看来，司马迁和班固是继承了“《春秋》家学”的，他们“所为”的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，堪称史学无疑。马、班以下，只有少数具有“别识心裁”之人，能有相似的成就。章学诚甚至认为“《通鉴》为《史节》之最粗，而《纪事本末》又为《通鉴》之纲纪奴仆；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，而止可为《史纂》《史钞》者也。”同时指出“郑氏之《通志》，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。”^③如此看来，即使像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、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郑樵《通志》这样的历史著作，也都不在“别识心裁，时有得其仿佛”之列，可以想见章学诚对“史学”的界定之严、期许之高。

不过章学诚毕竟没有对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全部否定，对郑樵也不仅仅肯定《通志》的“例”。他在《文史通义·申郑》篇中写道“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，前后一十九年，书局自随，自辟僚属，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，故能裁成绝业，为世宗师。”^④这样的评价，同把《资治通鉴》说成是“‘史节’之最粗”相比，可谓大相径庭。至于郑樵，章学诚作了这样的评价：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补遗《上朱大司马论文》，第345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，第294、295页。

④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《申郑》，第135页。

子长孟坚氏不作，而专门之史学衰。……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，而知作者之旨，不徒以词采为文、考据为学也，于是遂欲匡正史迁，益以博雅；贬损班固，讥其因袭；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，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……自迁固而后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；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……^①

这里说的“运以别识心裁”“成一家言”“有志乎求义”等，同上引“郑氏之《通志》，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之”似亦不相吻合。

从史学的继承和发展来看，即使是袁枢及其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章学诚也不应轻易地贬为“《通鉴》之纲纪奴仆”。他在同友人谈到修宋史问题时，极其兴奋地设想有关体例时写道：

《纪事本末》本无深意，而因事命篇，不为成法，则引而伸之，扩而充之，遂觉体圆用神，《尚书》神圣制作，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，至于可以仰追。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，纪传流弊至于极尽，而天诱仆衷，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！^②

这段话表明：纪事本末体的发明与运用，在袁枢那里“本无深意”，而一旦章学诚借鉴过来，就成了极大的创造，这是既没有尊重前人的创造，同时又回避了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继承关系。

综上，章学诚阐述“史学本于《春秋》”，强调《春秋》家法，赞扬司马迁、班固的贡献等等，理固宜然，但他认为“唐宋至今”，已无“古人所为史学”的结论，却是大有问题的。

第一，把“唐宋至今”史家们的历史撰述，归结为史考、史选、史纂、史评、史例等，这并不符合唐、宋、元、明至清前期史学发展的实际。即以“正史”而言，唐初所修八史，其间涉及南北朝史事的认识和编纂上的处置，民族迁移、冲突、融合等复杂情况的认识和表述，日历、起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《申郑》，第133—135页。

②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，第294—295页。

居注、实录、国史的撰写和积累，其中不乏史家的功力和见识。至于元修宋、辽、金三史，涉及三个不同民族之贵族为主所建立的政权的历史，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史家群体，都显示出宏大的魄力。元代学人能做到的，为何清代学人反而认识不到呢。再者，《通典》《通鉴》等书的问世，除史学发展的自然之理外，还有社会的要求和推动，章学诚同许多史家一样，是力倡史学的经世功能的，他说“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”^①而章学诚在评论“唐宋至今”的历史著作时，并未言及“史学所以经世”的问题，说明他在判断“史学”性质时，其结论是不全面的。

第二，章学诚把史考、史选、史纂、史评、史例等同“史学”完全割裂开来，也有可议之处，因为上述各项研究及其进展都是史学活动的产物，这些产物都是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；把它们同“史学”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，“史学”反倒成了难以理喻的东西了。退一步说，上述诸领域及其成果，也并非古人不“为”，而是有些项目古人没有处在可“为”的历史条件下，故不能有所“为”，如史评、史例等，只有当史学发展到比较成熟，有了较厚重的积累时，才能使人们有所“为”。章学诚本人就是“以议论言史”见长，而他的议论带有总结性质，故百余年后受到人们的赞誉。

第三，章学诚认为，“史学本于《春秋》”，又指出“盖《六艺》之教，通于后世有三：《春秋》流为史学，《官礼》诸记流为诸子论议，《诗》教流为辞章辞命。”^②按照“《春秋》流为史学”的说法，这个“流”到马、班已成“绝业”，“唐宋至今”沦为种种流弊，这种把“史学”视为唐、宋、元、明时期出现断裂现象的认识，是片面的、不符合实际的。这同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中》高度评价杜佑“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”^③的历史编纂气势；同他在《书教下》中讲到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时说，“按本末之为体也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，非深知古今大体，天下经纶，不能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。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，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”^④的创造；同他在《申郑》中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《浙东学术》，第53页。

②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补遗《上朱大司马论文》，第346页。

③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《书教中》，第11页。

④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《书教下》，第15页。

赞扬郑樵“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”^①，以及称赞司马光“裁成绝业，为世宗师”的评价^②，都不相吻合。

第四，尤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，章学诚在讨论修宋史问题时，一面把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贬为“史纂”、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贬为“史钞”，一面又把他自己“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，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”的做法，说成是“天诱仆衷，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”，意在弥合“唐宋至今”史学断裂的缺憾。在这里，“纪传之体”且不论，但袁枢的“本末之法”的运用和郑樵“图谱略”的启发，都不是来自史学上的借鉴而是“穷变通久”之后的“天诱仆衷”所得到的。显然，这种认识和这样的表述，都不能视为客观的和真实的。

总之，章学诚的史学观及其史学批评，在上述这些方面是有明显的缺陷的。

二 “史学所以经世”的传统是否中断？

《文史通义》的《浙东学术》篇，以极言史学的经世作用而著称。

首先，章学诚认为，中国学术之重视“经世”，其源盖出于孔子及孔子所作之《春秋》，他写道：

天人性命之学，不可以空言讲也，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。儒者欲尊德性，而空言义理以为功，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。夫子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，此《春秋》之所以经世也。圣如孔子，言为天铎，犹且不以空言制胜，况他人乎！故善言天人性命，未有不切于人事者。三代学术，知有史而不知有经，切于人事；后人贵经术，以其即三代之史耳。近儒谈经，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。浙东之学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此其所以卓也。^③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《申郑》，第134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135页。

③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《浙东学术》，第52页。

章学诚的这段话是要说明：孔子倡言“见诸行事”。《春秋》是史学经世之祖，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，如同司马迁那样，而浙东学术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。

其次，章学诚进而指出，史学所以经世，是史学的根本所在，不了解这一点，就无法谈论史学。他这样写道：

或问：事功气节，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？曰：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且如《六经》，同出于孔子，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。后之言著述者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事而言性天，则吾不得而知之矣。学者不知斯义，不足言史学也。^①

在章学诚看来，著述自然是重要的，但前提是要“切合于当时人事”，而那种空言性天的著述是不可取的，对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，“不足以言史学”。这是进一步论证他提出的这个命题——“知史学之本于《春秋》，知《春秋》之将以经世。”

此外，章学诚在讲到“不可易之师”与“可易之师”时还强调说：“学问专家，文章经世，其中疾徐甘苦，可以意喻，不可言传；此亦至道所寓，必从其人而后受，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，是不可易之师也。……至于讲习经传，旨无取于别裁；斧正文辞，义未见其独立；人所共知共能，彼偶得而教我。从甲不终，不妨去而就乙；甲不我告，乙亦可询；此则不究于道，即可易之师也……”^②从文中所说“文章经世”来看，这里讲的“道”，当也是指“经世”而言。可见，对于严肃的师生关系，也是用是否有经世之旨来看待“不可易”与“可易”的合理性的。

诚然，章学诚对史学所以经世之重要性的认识再三致意，可视为他对史学本质的认识。在他看来，如无此种认识，则不可与言史学。这无疑是章学诚关于史学的卓见之一。但是，这里也存在使人感到困惑之处：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与传统是世代相传、未曾中断的，且不说唐初所修八史的经世致用目的、盛唐吴兢撰《贞观政要》经世致用的初衷、中唐杜佑著《通典》的经世致用思想，也不举司马光、范祖禹及宋代许多史家的忧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《浙东学术》，第53页。

②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六《师说》，第187—188页。

患意识与多种历史撰述和明末清初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史家的经世致用宗旨，就是元修宋、辽、金三史，同样也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。其先，有大臣王鹗奏请撰修金、辽二史，写道“自古帝王得失兴废，班班可考者，以有史在。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，天戈所临，罔不臣属，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，若不乘时纪录，窃恐岁久渐至遗忘。金《实录》尚存，善政颇多；辽史散逸，尤为未备。宁可亡人之国，不可亡人之史。若史馆不立，后世亦不知有今日。”于是，“上甚重其言，命修国史，附修辽、金二史”^①。其后，有《修三史诏》，指出辽、金、宋“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、典章、治乱、兴亡之由，恐因岁久散失，合遴选文臣，分史置局，纂修成书，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、金、宋三国之由，垂鉴后世，做一代盛典”^②。如此明确的修史意图和修史宗旨，无疑是一种突出的经世思想的表现。据此，可以认为，自唐初至清初，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及相关著述，不绝于世，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。从逻辑上看，这种趋势应与章学诚所论的“史学经世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然而，联系上文章学诚所说“唐宋至今”，只有史纂、史考、史例、史选、史评，“古人所为史学，则未之闻矣”，既无史学可言，那么“史学经世”是否也就“中断”了呢？从章学诚的“浙东之学”论来看，“史学经世”的脉络似并未中断。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人们怎样折衷于章学诚说的“唐宋至今”无“古人所为史学”与“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”及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二者之间呢？显然，在笔者看来，这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。

为了从深层的意义上说明这种抉择的困难，我们不妨以杜佑《通典》为例。依章学诚所说，《通典》应归于“史纂”之列，但实际上章学诚对《通典》自有另一番评论，他写道：

杜氏《通典》，为卷二百，而《礼典》乃八门之一，已占百卷，盖其书本《官礼》之遗，宜其于礼事加详也。然叙典章制度，不异诸史之文。而礼文疑似，或事变参差，博士经生，折中详议，或取裁而径行，或中格而未用，入于正文，则繁复难胜，削而去之，则事理未备；杜氏并为采辑其文，附著礼门之后，凡二十余卷，可谓穷天地之

① 苏天爵《元朝名臣事略》卷一二《内翰王文康公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239页。

② 参见《辽史》附录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1554页。

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。^①

尽管这段话不是对《通典》的全面评价，而是仅就杜佑从体例上恰当地处理了制度之文与“详议”之论的关系，章学诚即认为这是“穷天地之际，而通古今之变者”，这显然不是对所谓“史纂”的评价，而是对所谓“古人所为史学”表达的敬意了。这很像是上文所讲到的章学诚对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两种不同的评价。

章学诚评价郑樵，更是明显地突破了“唐宋至今”无“古人所为史学”的论断。章学诚写道“若郑氏《通志》，卓识名理，独见别裁，古人不能任其先声，后代不能出其规范；虽事实无殊旧录，而辨名正物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，终为不朽之业矣。”^②这一评价，实已不在评价杜佑《通典》之下。不仅如此，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中更著有《申郑》专篇，文中写道，在司马迁、班固以下，“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，而知作者之旨，不徒以词采为文，考据为学也，于是遂欲匡正史迁，益以博雅；贬损班固，讥其因袭；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。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”又说“史家著述之道，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！自迁固而后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；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……”^③这些评价表明，在章学诚及其《文史通义》中，郑樵和他的《通志》占有极突出的地位。

综上，从章学诚对司马光的两处不同评价中，以及他对杜佑、郑樵的评价中，他的“唐宋至今”无“古人所为史学”的论断，还能够站得住吗？这确是一个有关章学诚史学观的重要问题。

三 是前行，还是回归？

章学诚的史学观有丰富的内涵，真知灼见屡有所出，令人钦羨。《文史通义》开卷论证“六经皆史”^④，不仅扩大了史学的空间，也提高了史学的自信。他论史学有两大宗门，即“记注”与“撰述”的并存及其各自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《书教中》，第11页。

②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《释通》，第132页。

③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《申郑》，第134、135页。

④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《易教上》，第1页。

的特点。^①他强调“史法”与“史意”的差别，指出讨论设馆修史与探究私家撰述的不同，认为“吾于史学，盖有天赋，自信发凡起例，多为后世开山”^②。他以“史德”补充刘知幾的“史才三长”，强调史德的重要。^③他倡导“闾中肆外，言以声其心之所得”的叙事准则^④。他把知其人之世及其人之身处作为学术批评的基本出发点^⑤，等等，都是真知灼见。他还以朴素辩证的观点看待史书体裁的变化，指出：

神奇化臭腐，臭腐复化为神奇，解庄书者，以谓天地自有变化，人则从而奇腐云耳。事屡变而复初，文饰穷而反质，天下自然之理也。《尚书》圆而神，其于史也，可谓天之至矣。非其人不行，故折入左氏，而又合流于马班。盖自刘知幾以还，莫不以谓《书》教中绝，史官不得衍其绪矣。又自《隋经籍志》著录，以纪传为正史，编年为古史，历代依之，遂分正附，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。则马班之史，以支子而嗣《春秋》，荀悦袁宏，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。司马《通鉴》，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；袁枢《纪事本末》，又病《通鉴》之合而分之以事类。按本末之为体也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，非深知古今大体，天下经纶，不能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。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，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。在袁氏初无其意，且其学亦未足与此，书亦不尽合于所称，故历代著录诸家，次其书于杂史，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。但即其成法，沉思冥索，加以神明变化，则古史之原，隐然可见。书有作者甚浅，而观者甚深，此类是也。故曰，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，本一理耳。^⑥

章学诚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，多有辩证思想，此即突出一例。章学诚与刘知幾相比，前者更看重通史，故对司马迁、郑樵多有褒奖，后者更关注断代史（朝代史），故对《左传》《汉书》格外在意。章学诚在《释通》

① 参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之《书教上》《书教下》，第7、12—13页。

②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二《家书二》，第333页。

③ 参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五《史德》，第144—147页。

④ 参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《文理》，第61—64页。

⑤ 参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《文德》，第59—61页。

⑥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《书教下》，第14—15页。

中写道:

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，于是上起三皇，下讫梁代，撰为《通史》一编，欲以包罗众史。史籍标通，此滥觞也。嗣是而后，源流渐别，总古今之学术，而纪传一规乎史迁，郑樵《通志》作焉；统前史之书志，而撰述取法乎《官礼》，杜佑《通典》作焉；合纪传之互文，而编次总括乎荀袁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作焉；汇公私之述作，而铨录略仿乎孔萧，裴潏《太和通选》作焉。此四子者，或存正史之规，或正编年之的，或以典故为纪纲，或以词章存文献，史部之通，于斯为极盛也。^①

这一段话，对“通史”的源流和发展作了精彩的概括。凡此，都受到后人的关注和重视，视为确论。然而，通观《文史通义》，细究章学诚提出的重要论断及其相互间的关联，总觉得在有些论断之间使人感到费解。对此，我们不妨作如下简要的分析。

如章学诚讲史书体裁的演变，以辩证的观点进行分析，本是极佳的阐述，但说到纪事本末体出现之时，却一再强调这是“真《尚书》之遗也”，是“神奇化臭腐，而臭腐复化为神奇”的表现。我们是否可以认为，在这里，章学诚强调的不是发展而是回归，即回归到《尚书》“因事命篇”所具有的“神奇”那里。其实，任何事物的产生、发展，都有自身的规律。若以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同《尚书》中以纪事为主的相关篇目作比较，则前者在内容的丰赡、叙述的细致方面，远非后者可比拟，反映了“因事命篇”叙事的发展。唐代史家刘知幾批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“同为一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前后屡出”^②。稍晚于刘知幾的皇甫湜著《编年纪传论》，认为编年体史书的缺点是“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，是以多阙载、多逸文”，故当“别为著录，以备时之语言，而尽事之本末”^③。刘知幾提出了问题，并未作进一步论述；皇甫湜则认为司马迁创纪传体是“尽事之本末”的途径，与刘知幾看法完全不同。但他们都认为，应当有

①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《释通》，第129—130页。

② 刘知幾《史通·二体》，浦起龙通释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5页。

③ 李昉等编《文苑英华》卷七四二，中华书局1966年版，第3876页。

一种按照事件本末的历史表述形式产生出来，这是他们分别从批评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史书中得到的共同结论。从章学诚对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评论来看，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最重要的优点正是“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”。这显然是针对纪传、编年两种史书体裁说的。如果把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看作是“臭腐复化为神奇”，即回归到因事命篇的《尚书》那里，则《尚书》所产生的时代，既无纪传体史书，亦无编年体史书，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，至少是有缺陷的。

再如前引关于通史的演变，章学诚举出《通志》《通典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太和通选》等书，并作出结论说“史部之通，于斯为极盛也。”然而，大家知道，这四部书中两种出于唐代，两部出于宋代，按照章学诚关于“唐宋至今”云云的观点，它们都不属于“古人所为史学”，怎么又成了“史通之通，于斯为极盛”了？这里，似也存在使人感到困惑之处。当代治中国史学史之名家杜维运指出：

章氏之史学，有其完整之体系，非随得随发，漫若散沙也。惟中国之史家，非若西方史家曾接受逻辑学之严格训练，于其史学体系，不能提纲挈领，为有系统有组织之叙述，理论愈深者，后人愈难明其理论之全部真相。以章氏之尊崇“学有宗旨”之一家著述，其理论体系，后人亦难骤然而窥知，甚且为后人所曲解。治其学之有得者，亦只能窥其史学之一面。^①

从杜维运的这一段话来看，《文史通义》中的有些论述不失为真知灼见，但它们之间至少在“逻辑”上难免有瑕疵，本文所举数例可见一斑。这种瑕疵并非经过他人对《文史通义》之理论从体系上进行整理就能够弥合的，“治其学之有得者”知道这种“逻辑”上的缺陷的存在就是了，而不必走向“曲解”章学诚的境地。

依我的浅见，除了逻辑上的瑕疵，章学诚在学术思想上还有另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，这就是：他提出“六经皆史”，自是一个积极的论断，多得后人赞许。但章学诚在讨论历代史学发展时，多以“六经”为准则，史学演变的结果，都以回归“六经”为至善。这样一来，章学诚关于史学的

^① 杜维运 《清代史学与史家》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336页。

许多论述就不能自觉地从发展、进步的观点进一步展开，而囿于“六经”的范围。当然，我们不应苛求章学诚，但从进步的、变化的观点看待学术的演进，古代史家是有先例的。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》序中这样写道：

学术之不同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。奈何今之君子，必欲出于一途，剿其成说，以衡量古今，稍有异同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，时风众势，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。夫道犹海也，江、淮、河、汉以至泾、渭蹄蹠，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，其各自为水者，至于海而为一水矣。使为海若者，泅然自喜，曰“咨尔诸水，导源而来，不有缓急平险、清浊远近之殊乎？不可谓尽吾之族类也，盍各返尔故处！”如是则不待尾闾之泄，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。今之好同恶异者，何以异是？^①

黄宗羲对学术的认识，一是包容的，二是看到“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”的前行之势，即向前看，而不是向后看，更不是回归到某个起点。这是黄宗羲的史学观同章学诚的史学观的一个重要的区别。

白寿彝先生在讲到浙东史学时指出“章学诚是乾嘉年代的史学大家，他所著《文史通义》《校雠通义》，对历史哲学、历史文献学、历史编辑学和历史文学都有论列，并颇多新意。但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，很少为同时学者所重视。他也评论当时流行的风习，而基本上以文史方面的问题为限，比起当年黄宗羲的风范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”^②白寿彝先生所说的“风范”，包含学术本身和学术影响，而章学诚在包容性和向前看方面，都显示出他自身的局限性。

当然，章学诚因在史学理论领域有多方面“颇有新意”的论述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者，他的这种学术地位，并不会因其学说有逻辑上的瑕疵和思想上的局限而有所改变。本文的撰写，意在表明：我们过去研读《文史通义》，比较关注他在某一具体方面的精辟论述并为之赞叹，而较少考察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同另一方面的论述是否协调，是否完全符合逻辑，也较少顾及章学诚强调史学对于“六经”的回归，等等。质而言之，我们对于章学诚及其《文史通义》的认识是否还缺乏全面的研究和深

① 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之《明儒学案》序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白寿彝《中国史学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1册，第88页。

入的思考，至少，笔者正是这种状况，而当我们“发现”某种瑕疵和局限的时候，或许我们会觉得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和真实的章学诚，对他的《文史通义》中的许多真知灼见有了更加理性的判断和评论。

2015年6月21日初稿

7月26日改定